

从西化改革到伊斯兰革命^{*}

——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

蒋 真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的政治进程中经历了参与、退出,再到主导的过程,使伊朗的政治制度从世俗的君主专制政权变成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神权国家。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改革忽视了伊朗国情,最终导致了君主制的覆灭。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在规范伊斯兰政治秩序的同时,也使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面临寻求政治与宗教平衡的难题。

关键词: 西化改革; 伊斯兰革命; 法吉赫; 平衡

中图分类号: B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0)03-0084-05

伊斯兰教什叶派自从成为伊朗官方宗教以来,在伊朗的政治进程中经历了参与、退出,再到主导的过程,最终形成的神权政治治理模式成为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研究的典型。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到霍梅尼神权政治理论的实践,1979年伊斯兰革命引起的伊朗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观的彻底更换,既是学界对伊斯兰政治理论研究的范例,也是让学者们产生困惑的问题。伊朗的政治制度演变在经历大起大落之后,如何缓和宗教和政治两大因素之间的竞争性,实现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始终是当代伊朗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

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伊朗政治现代化的起点。革命因宗教力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广泛参与,使未来伊朗的政治发展注定要打下伊斯兰教的烙印。有学者认为,乌勒玛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国家政权的辩护者,在反对西方列强和腐朽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伊朗民族主义的形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定下了宗教的基调。^{[1]239-246}因此,要研究当代伊朗的政治发展和理解当前伊朗的政教关系,立宪革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这一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初,西方势力开始向伊朗扩张,他们凭借武力优势,强迫伊朗签订各种条约。恺加王朝后期,国王为满足其挥霍的生活,逐步出卖国家主权。正当伊朗国内政治形势恶化,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之时,1905年初,伊朗发生灾荒,物价上涨,民众走向街头抗议政府的无能。1906年4月,德黑兰爆发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宗教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在一封给政要的信中提出,只有建立议会,在国家和政府之间建立联系,在乌勒玛和政府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平息目前的局势。^{[1]103}

收稿日期: 2010-02-05

作者简介: 蒋 真 (1979-),女,湖北南漳人,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地区政教关系。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动中的神权政治——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08XSS003)和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伊朗核问题与大国关系研究”(06JK010)的阶段性成果。

1906年8月,伊朗国王穆扎法尔丁在各界压力下发布建立议会的命令。10月,立宪会议召开。12月,伊朗颁布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基本法》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没有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向外国臣民提供租让和签订租借条约。1907年,伊朗国王被迫签署《基本法》补充条款,伊朗宪法至此基本完善。此时,宪法中的宗教色彩很浓,宪法补充条款中明确规定,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伊朗的国教,采用世俗与宗教二元并立的法律体系,议会颁布的一切法律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议会设立5名教界议员组成宗教委员会,有权废止不符合伊斯兰教原则的法律。^{[2] 270}

伊朗立宪革命尽管由于内部分裂和在外来干预下,历时5年而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伊朗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6~1911年的立宪运动是伊朗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一次预演,即便是在以西方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体制框架下,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国教地位仍然被作为宪法而载入史册。不仅如此,该地位所带来的相应的权力使得伊朗政治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始就打上了二元结构的烙印,从而奠定了后来伊朗政治演变的基调,即如何寻求政治与宗教的平衡。其意义表现在:第一,从理论上,立宪革命是伊朗寻求独立、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一步,通过反对列强侵略和王权专制,为伊朗的政治现代化掀开了现代篇章。其间,不管是世俗团体还是宗教阶层,他们在努力寻求符合伊朗国情发展模式的同时,与世界各地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相呼应,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第二,从制度上,立宪革命在伊朗历史上首次引入宪法和议会的概念,并加以实践,成为后来伊朗现代政治的模板。与此同时,伊斯兰因素在宪法中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伊朗未来政治现代化必须面临的困境——平衡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伊斯兰教以宪法形式融入了伊朗政治,一方面是伊朗政治现代化乃至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模式发展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政治批判的矛头所在,从而使中东原生态的宗教民主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之争成为当代中东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第三,从斗争形式上,宗教势力、巴扎商人与知识分子的大联合在立宪革命中得到了演练,也为后来伊朗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种模式。尤其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宗教阶层凭借与巴扎商人的历史联系,借助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的创新和政治主张的吸引力,实现了在全国范围的总动员,最终迎来了伊斯兰革命。

二

1921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恺加王朝哥萨克旅的将领礼萨汗率军进入德黑兰。1925年底,立宪会议宣布礼萨汗为国王,巴列维王朝从此开始。为结束伊朗国内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礼萨汗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改革,如统一部族、加强中央集权、消减宗教势力等等。^{[3] 223}

巴列维王朝改革的高峰始于1963年1月的“白色革命”。其内容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有工厂的股份、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企业分红、建立扫盲大军等等。1967年又加入6项改革措施。1975年土改完成后,又增加了7项改革方案。^{[4] 317}巴列维称:“这场革命应该完全改变伊朗社会的基础,使它能同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媲美,并且成为具有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的最进步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5] 365}与此同时,为巩固君主权力,巴列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为避免地方权力过于膨胀,威胁到中央权威,巴列维对伊朗国内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规划,省区由10个增至23个。第二,加强伊朗军队和秘密警察建设。1963~1977年,伊朗军队人数从20万增至41万,1963~1973年,军费预算从不足3亿美元增至18亿美元,1977年高达73亿美元。1977年时的伊朗拥有波斯湾最强大的海军和中东最先进的空军,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2] 307}第三,为掌控国内的政治势力,巴列维宣布废除两党制。1964年,国民党和民族党合并成新伊朗党;1975年,复兴党取代新伊朗党,成为伊朗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其任务是铲除背离官方的思想倾向,实现伊朗人民的思想统一。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政体,会在国家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改革计划中崩溃。巴列维王朝的终结缘于其现代化改革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上的失误。第一,从理论上来看,巴列维发起白色革命及后来的西化改革的目的是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资本主义新经济。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的经济面貌,但经济改革的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巴列维的专制统治,他在政治领域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改革,而是强化王权控制,导致滞后的政治改革与急速先行的经济改革之间产生矛盾。经济改革释放出的新因素最终不能被政治权力所控制,从而注定了专制王权的崩塌。第二,土地改革的不彻底引起各界不满。土改并没有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土

地再分配是以不触动大地主的根本经济利益为前提,对农民作出部分让步。例如大地主们留下收益最高的地产,没有分给农民;法律豁免某些类型的土地,如机耕地、果园和公共宗教地产,使一些地主逃避了土改;土改法中未提及土地灌溉用水问题,故而产生了许多纠纷;土改使土地分散到各个农户手中,不利于有效地进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耕作。^{[6]80}第三,照搬西方、不尊重伊朗国情的发展模式使改革失去民心。为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巴列维在大力推广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时忽视了伊朗的国情。在农业方面,政府既想消灭未曾有效解决的租佃关系,将所有佃农迅速变为自耕农,又想加速耕作机械化和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且采取建立国营农场企业的行动强迫自耕农加入。这种矛盾的做法是对土地再分配计划的否定,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成为牺牲品。在工业方面,工人入股分红以及提高社会福利的做法,目的是为了借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消弭阶级对立,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有关工人分红的法令本身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参加分红的企业和税务机关勾结,虚报企业利润。同时物价上涨速度过快,经常使工人分得的钱在年终到手时已经大大贬值。第四,没有处理好与宗教阶层的关系,低估了宗教势力的社会动员能力。从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到巴列维的西化改革,王权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直比较激烈,这两种势力时而联合时而竞争。随着巴列维政权的巩固和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的需要,打击和削弱宗教势力成为该时期改革的重要内容。土地改革后,宗教界人士的实际收入下降,削弱了他们在伊朗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另外,工业现代化改革带来的西方文化也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信仰提出挑战。1964年,霍梅尼在批评议会授予美国公民外交豁免权时说:“来自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涌入伊朗,以投资的名义奴役我们的人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政府屈服于殖民主义……现行的政府力图毁灭伊斯兰教及其神圣的法律。只有伊斯兰教和乌勒玛能够阻止殖民主义的侵犯。”^{[3]368}

三

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由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教士集团领导的反对世俗专制王朝的“全民起义”。革命的胜利最终导致了伊朗神权政治体制的建立,教法学家权威统治治国理念的宪法规定,在伊朗形成了以法吉赫绝对权威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并对未来伊朗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是否将教法学家权威统治写入宪法在当时的伊朗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论,但最终成为法律。1979年宪法的出现,确定了伊朗教法学家统治的立国根基,法吉赫体制得以最终确立。霍梅尼集宗教与政治权力于一身。凭借1979年宪法中规定的教法学家治国条款,霍梅尼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干预三权,而且还凌驾于宪法之上。他通过发布宗教法令的形式成立各种具有行政和立法性质的机构,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进行干涉。在司法领域,霍梅尼通过在各司法机构设置个人代表来干预司法事务。在行政领域,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战斗,战斗,直到最后胜利”和输出革命等口号在伊朗的内外政策中起着纲领性作用。

除此之外,为巩固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和维护法吉赫体制的权威,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系列伊斯兰性质的权力机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有国家权力机构产生重叠,甚至新产生的各个革命机构之间也有权力重叠现象,如伊斯兰革命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伊斯兰革命法庭(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rt)、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public Guards Corps)、伊斯兰基金会(Islamic Foundation)、宪法监护委员会(the Guardian Council)、最高伊斯兰宣传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Islamic Propaganda)等机构。为了统一政党观点,还建立了革命后的唯一政党——伊斯兰共和党(Islamic Republic Party)。另外,随着情报组织和武装治安组织的成立,1983年又成立了情报部,1984年打击违法治安巡逻队(the Vigilante Patrols for Combatting the Forbidden)成立。

在加强革命后的政权和执行伊斯兰化政策时,宣传革命精神和教化的礼拜也被制度化。作为政府政策的宣传手段,礼拜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其网络从中心城市到偏远乡村,只要有礼拜就可以达到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尤其是在闭塞的农村地区宣教,对教法学家权威统治治国理念的宣传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外交政策及其反美反以的宣传等,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政府还进一步强调了清真寺的作用,清真寺不仅是向人民发放食物和收集地区居民居住信息的重要场所,还保存有地区信息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1984年9月,霍梅尼任命成立领拜总部中央秘书处,称该组织

是“革命的重要支柱、领袖的口舌和组织动员强有力的臂膀”^{[7]168}。但这一组织同伊斯兰共和党在加强管理和动员民众的职责上产生重叠。1987年6月1日,伊斯兰共和党被下令全面停止活动。赛义德·艾米尔·阿贾迈德认为,这正反映了伊朗伊斯兰政权对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的一种认识,将清真寺和宗教集会而不是政党和政党活动作为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式。

综上所述,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作为20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伊朗的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体制,将一个亲西方的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对后来的伊朗政治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治国理念不仅为当代伊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其发展设置了政治背景,是当代伊朗现代化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来源。总的来讲,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是伊朗继巴列维王朝现代化改革失败后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选择,希望通过本土文明的发扬,来抵制前王朝现代化运动中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希望通过在独立和封闭的环境中的奋进获得现代化进程的新突破。

四

如果说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扭转了伊朗政治制度演进的方向,那么1989年霍梅尼去世和1989年宪法修订则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的新转机。霍梅尼去世虽然并没有改变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现状,但他的离去的确结束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时代。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国内对霍梅尼治国理念的重新解释和有关伊朗改革底线的激烈争论,为伊朗未来的政治制度演变增添了新的内容,寻求政治与宗教的平衡成为未来伊朗政治进程的主要特征。

哈塔米的上台被外界称为伊朗的“二次革命”。其本人也受到了政治观察家们的好评,认为他是“一只脚踏在西方文明中的总统”,甚至还有人将其称之为伊朗的“阿亚图拉戈尔巴乔夫”。^{[8]81}其政治主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对内适度开放,建立伊斯兰民主政治。哈塔米认为,伊朗可以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伊斯兰民主政治,因为《古兰经》已经规定了这一切,宗教与民主是可以相容的。宗教民主既反对僵化和独裁,也反对政教分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宰国家的命运,但同时也维护宗教的价值观。1999年2月,伊朗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地方议会选举,各种派别、各个种族以及青年和妇女前往投票点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正如哈塔米所说,我们正见证着伊朗人民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已经向自由和民族骄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2 建立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是哈塔米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哈塔米上台后,在一次电视演讲中表示,如果在获得“快速发展”和确保“社会公正”之间产生冲突时,优先权将属于后者,他说:“社会公正应当是我们政策的焦点,为了社会公正,我们将会放慢速度。”^{[8]81}指出建立公民社会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伊朗所提倡的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公民社会有所不同。西方的公民社会建立在希腊罗马文明遗产之上,而他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先知之城的基础上。他认为,这两种公民社会其实并不冲突,伊斯兰教需要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因素。伊斯兰教的思想和文化是这种公民社会的中枢,在这个社会里,政府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他们应当尊重安拉赋予人们的自决权,向人民负责。^{[9]145-146}

3 放松文化控制,关注妇女和年轻人。放松文化控制,建立宽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哈塔米担任伊斯兰教文化指导部长时就提出的主张。担任总统后,这一主张仍是其施政纲领的重点。尽管伊朗电视和广播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由领袖任命,但其在保守派打击不同政见者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哈塔米上台后,伊朗媒体行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哈塔米执政第一年,新增出版物达200多种。占伊朗人口70%的青年也是哈塔米关注的对象。这些年轻人大多出生于伊斯兰革命后,没有革命时期的宗教狂热,对外来世界充满好奇,易于接受开明的新观点和政策,他们是哈塔米当局所倚重的对象之一。哈塔米政府的另一个支持团体是妇女。哈塔米主张提高妇女地位,认为妇女应当出现在政治、社会和宗教论坛上。

4 主张务实外交,倡导“文明间对话”。哈塔米上台以来,伊朗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形象大为改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1999年5月3日至5日,伊斯兰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研讨会在德黑

兰召开,会议通过了《德黑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宣言》。“文明间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为伊朗外交的新亮点。哈塔米作为“文明间对话”的首倡人之一,认为文明对话可以加深各国之间的了解,增加世界范围的和谐,减少国际间冲突,创造包括一切文明在内的世界新文明。从本质上来看,“文明间对话”仍然来自伊斯兰的最高教义,其中赞颂人的多样性、承认知识的不同来源、推动对话和相互理解、真正相互尊重人与人的交往,以及鼓励按照理性和逻辑开展礼貌文明对话等总原则分别引自《古兰经》第四十九、二、三、六、二十、十六章。哈塔米还认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互惠交流,东方教会西方认识到人类生活中精神的极度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学到西方文明成就的积极方面。^{[10] 225}

尽管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但任何政治变革都是在伊斯兰体制框架下进行的,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逾越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和原则。一旦逾越了这个底线,其改革就会遭到保守派甚至宗教领袖的反对,这也是为什么保守派能重登伊朗政坛、党派斗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宇洁. 伊朗伊斯兰教史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2]哈全安.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 John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M]. Westview Press, 1993
[4]彭树智, 主编.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5][法]热拉德·德·维利埃. 巴列维传 [M]. 张许苹, 潘庆龄,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6] 张振国. 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7] 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 David Menashri.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Ira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wer [M]. London, 2001.
[9] Ali M. Ansari. Iran, Islam,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Managing Change [M]. London, 2000
[10] R. K. Ramazani. “Reflection on Iran’s Foreign Policy: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Iran at the Crossroads [J]. New York, 2001

From the Westernization to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n political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ran

JIANG Zhen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

Abstract Shiite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the participation, withdrawal and domination in Iran’s politics, in which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Iran changed into theocracy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Islam from secular monarchy. Pahlavi’s Westernization reformation neglected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ulture of Iran, which led to the end of the dynasty. The new authority buil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79 not only regulated the Islamic order of this country but also made Iran face the historical task to seek for the balance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Key words Westernization; Islamic revolution; Faqih; balance

(责任编辑 敬 军)